

在调查研究中提高本领

——读《陈云与调查研究》有感

□周倩

《陈云与调查研究》一书2004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列举了多篇陈云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总结了陈云调查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并编入了相关珍贵历史资料。读完《陈云与调查研究》一书后，感到陈云在调查研究方面的独立见解、独特方式、独到总结，今天依旧闪烁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熠熠光辉。

把调查研究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功”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中央分局书记。当时分局有些干部曾幻想苏联撤军时将大城市管理权和武器装备留给我们，但后来却交给了国民党。陈云从实际出发，在东北地区进行了大量细致调研，1945年11月份主持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应暂时撤离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在包括中小城市和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乡村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将来转入反攻和取得全局胜利奠定基础，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党在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后来，又有一部分干部群众对和平抱有幻想，寄希望于国共停战带来和平。陈云根据自己在北满农村调查研究中总结的大量数据，准确把握形势任务和实际需求，1946年7月，起草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七七决议”）。力图使领导干部认清敌强我弱的现实，认清必须长期斗争，以战争胜利取得和平。这份决议，中共中央做了部分修改后批准执行。根据“决议”要求，东北局明确了主要任务，其中就包括号召共产党员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下乡发动群众等。在此影响下，1948年东北野战军进关时，部队数量由1945年的10万迅速扩充到百万以上，装备也得到明显改善。

陈云初到东北并没有麻痹大意，而是分析形势后通过下基层、访群众、查资料的方式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用数据说话，得出了与相当一部分干部不同的结论，之后再通过更深入细致的调研，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定了发动群众的工作思路，改变了东北的整体局面和干部思想作风，为今后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云这种谋而后定、

调研先导的工作方法正是党员干部应该学习的“基本功”。

把调查研究作为改进工作的“总抓手”

1944年到1945年，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当时，陕甘宁边区加上晋绥边区共有150万人口，却要养活5万脱产军民，财政极端困难。物价飞涨，1942年比1941年上涨了3倍多，1943年又上涨了20多倍，边区人心不安，群众拿着边币抢购物资，对当时的大生产运动，是个巨大的冲击。陈云到任后，迅速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后确定了发展生产、加强外销、减少印币的总体思路。他几乎每天都去延安南门外新市场转一转、看一看，随时了解和研究市场情况，及时和边区银行的干部交换意见，对边区的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情况了如指掌。一年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基本生活物资正常交换。

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一年的工作中每天都在进行调查研究，随时掌握第一手数据和资料，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加强和改进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依据。在陈云看来，任何工作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越困难的时候越要细致调研，绝不能草率下决定，只有找到困难和问题、问题的核心，才能找准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才能扭转局面、摆脱困境。这一年的经历不仅为发展边区经济、保障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也为陈云日后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部署的“定心丸”

1978年底，中日双方达成总投资320亿美元建设宝钢的合同，其中中国国内投资200亿人民币，这对当时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1979年初，我国对22个国外引进的重点工程重新安排建设计划，宝钢是其中最大的项目，列为需要重新审议和调整的项目首位。宝钢对外已签的合同由于国家缺少现汇而无法批准生效，待签的一大批合同的对外工作也告停顿。当时很多人有

悲观论调，认为“建成后每年只能支付利息、贷款，几辈子也还不清”“会给予子孙后代留下后遗症”等。197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请陈云出面解决宝钢问题。陈云先是在北京召开了多次调研座谈会，详细了解了宝钢的来龙去脉；然后又亲自到上海，听取上海市负责同志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认真了解情况。同时，安排人到现场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1979年6月16日，陈云对宝钢建设提出了“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宝钢建设只能搞好”等建议，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向中央的专题报告并经中央批准执行，为宝钢的建成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对宝钢的调查研究，既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也说明了实事求是做好调查研究对决策部署的至关重要。陈云用了50天的时间，从各维度各层面认真细致深入调查研究，摸准实际情况后又站在国家信用和形象的高度，提出了符合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工作方针，扭转了宝钢建设初期的困境。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超大规模的投资，如果没有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详细充分的数据支撑、没有历史担当的胸怀气度，是很难下定决心作出决策的。

陈云在工作中，长期坚持调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越是面对困难，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能用调查研究的手段解决问题。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真务实和“交换、比较、反复”的严谨方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陈云与调查研究》这本书，为党员干部学习、实践、运用调查研究方法解决问题提供了丰富经验和宝贵参考。



“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

——司马光的治学之道

□张林

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套卧具：一张坚硬的木板床和一个圆木枕头。用圆木当枕头，在木板床上，只要睡觉的时候，头稍微一动，圆木就会滚落开来，头就会直接触及木板床，这样人也就会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起床继续阅读。司马光对这种“惊醒”方式非常满意，特地给圆木枕头起了个名字，叫做“警枕”，久而久之，有了自创的“警枕”读书法的加持，司马光也养成了“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刻苦读书的习惯。

“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的著书方法

司马光治学的重点是史学，他自言对史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独宠王安石，全力支持他变法，对于反对变法的人加以排斥，尤其是司马光的同僚兼好友范镇因直言上书王安石的变法之策是“残民之术”而被罢官后，司马光自感“了却君王天下事”“解君之忧”无望，便自请外放，出任地方官。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批准他到西京洛阳御史台工作，实则要他安心赋闲，不问政事。就这样，司马光在

洛阳“独乐园”一住就是15年，在洛阳期间，司马光奉诏收集编写历代君臣的事迹。在此基础上，他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稽古录》等多卷本史书，很好地展现了司马光的著书方法和治学风格。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记载了编著该书的初衷：“每患迂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上起战国，不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以来，史书文字太多，普通读书人都不能读尽；何况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更没有空闲时间去看。他希望能从文字众多的史料中取其精华，编成一书，务为可用，于军国政事有益。

除了《资治通鉴》以外，司马光又编集了《稽古录》，该书包括《稽古录》《历年图》《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3个部分，共计20卷，记录了从远古时代到宋英宗时期历朝历代的大事件，所附加评论，都是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剖析。后人都对此书评价很高，像朱熹就直言“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清代《四库全书》评论道：“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后人将《稽古录》称之为《资治通鉴》的姊妹篇。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吹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冲锋号。我国为何要编制和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哪些历史性成就？如何深入学习领会规划《建议》？《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11期聚焦“以五年规划引领发展开启新局”，约请专家学者撰文探讨。

回顾和总结我国编制和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历史，可以深切体会我国的制度特色和制度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在《以五年规划引领发展是我国的制度特色和制度优势》一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确立了工业化基础，通过实施第二个至第五个五年计划建立了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没有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发挥好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在《“十三五”时期的辉煌成就和基本经验》文章中总结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及八条基本经验。文章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主题，努力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为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规划《建议》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谋划》一文中认为，这次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起步期，必须走好走稳走实。“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大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规划《建议》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被赋予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群慧在《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中认为，2035年我国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有力推动我国高质量工业化进程深化；二是有力支撑我国工业基础高级化水平提升；三是有力促进我国制造业智能化服务水平提高。

规划《建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以五年规划引领发展开启新局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二期聚焦

□范丽君

院研究员孙长学在《在新起点上擘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文中分析认为，规划《建议》是一个处处饱含新意的规划，把握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新”上，就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文章认为，在全方位审视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下，规划《建议》提出重大判断，即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要充分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新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他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主持编写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成书294卷，历时19年完成，贯通古今。官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被世人推崇备至，“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司马光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可以说与其多年的读书治学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的读书态度

司马光知识渊博，学问精深。《宋史·司马光传》中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说他少年老成，7岁时就能懂得《左氏春秋》的大道理，拥有很强的学习理解能力。其实，小时候的司马光对自己的智力并没有什么自信，常常担心自己的记忆力不如别人。朱熹在编辑的《三朝名臣言行录》中就记载：“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诵乃止。”司马光在和众兄弟们一起读书时，等到其他人都能够背熟古文去玩耍了，唯独只有他还在继续背诵，一直到能够背过为止。

司马光曾言：“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司马光对其读书心路历程的自述，道尽了他读书背后鲜为人知的辛酸。司马光为了克服偷懒嗜睡的惰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他

洛阳“独乐园”一住就是15年，在洛阳期间，司马光奉诏收集编写历代君臣的事迹。在此基础上，他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稽古录》等多卷本史书，很好地展现了司马光的著书方法和治学风格。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记载了编著该书的初衷：“每患迂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上起战国，不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以来，史书文字太多，普通读书人都不能读尽；何况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更没有空闲时间去看。他希望能从文字众多的史料中取其精华，编成一书，务为可用，于军国政事有益。

除了《资治通鉴》以外，司马光又编集了《稽古录》，该书包括《稽古录》《历年图》《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3个部分，共计20卷，记录了从远古时代到宋英宗时期历朝历代的大事件，所附加评论，都是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剖析。后人都对此书评价很高，像朱熹就直言“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清代《四库全书》评论道：“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后人将《稽古录》称之为《资治通鉴》的姊妹篇。

从上述，可以看出司马光著书治学的一些风格。首先，著书的性非常强，就是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劝善惩恶，正言直笔”。司马光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提供给最高统治者作为治国理政的参考。其次，著书资料搜集要充盈。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动笔写历史事件之前，都要先广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笔记等，然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辨析史料的真伪，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务求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据说当时经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2间屋子。最后，著书语言要简洁明了，简单易读。司马光要求在编写中“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史料和事件编排上有所取舍，专门捡取关系国家兴亡、百姓生计的大事，编为一书。

“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的行文特点

除了史学上的成就，司马光在诗词、散文和杂文上的造诣也颇深。司马光生活的年代，正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阶段，即革除五代旧习、摆脱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及浮华轻靡的文风，要求文章写作反映社会现实。司马光也不例外，必然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司马光作为北宋朝堂上的政治家，他的文章无不针对社会弊病，为感于时事而言，为纠挽流习而发。苏轼称之为“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王安石为相期间推出的诸多变法措施，在浸染儒学教育多年，“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的司马光眼中有太多不合理之处，违背了孔圣人的有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诲。在当时炙手可热、有皇帝坚定支持的王安石这里，几乎听不到不利于变法的言论，但是司马光还是冒着得罪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的风险，硬着头皮前后3次写信给王安石表达反对意见，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与王介甫书》。他在信中向王安石直言：“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

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鬻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司马光信中直截了当地列举了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病，要求王安石废除变法措施，恢复祖宗旧制。

司马光在与王安石的书信争辩中，就事论事，没有因为其他人对王安石的人品评头论足，就趁机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贬损人格，恰恰相反，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是“贤人”，只是功利心太重、过度自信而已，切实体现了司马光的“君子之风”。书信内容开诚布公，直击要点，不说假话空话，不写华而不实的套话废话，完全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充分体现了他“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的行文特点。

司马光常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司马光治学之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治学过程中敢于付出行动，而不是崇尚空谈。只有具备治学严谨、求实、勤奋、刻苦的精神，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